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中國城市研究探索

馬傑偉 編

中國城市研究探索

馬傑偉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09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七十九號

中國城市研究探索

Exploring Chinese Urban Studies

編者：馬傑偉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刷：卓利製作公司

版次：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62-441-579-7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言：城市研究跨學科議題與方法學

馬傑偉

城市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其中涉及地理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人類學、史學、旅遊研究等方法與概念。在國內更有不少任教於中文系和翻譯系的教授參與城市研究。眾多學術傳統的交匯，既有矛盾，亦可創新。一般而言，人文學者在學理上傾向質化分析，認為城市文化不能量化統計；但社會學、地理學較多實證的量化分析。本專輯把不同學科的文章結集成書，不避跨學科的隔閡，試圖展現城市研究在議題與方法學上的多樣性。本書的論文取向包括歷史檔案研究、把城市當作文本的文化剖析、量化的問卷調查、以大量數據整理出來的競爭指標、民族誌考察、空間政治的文化研究、旅遊及城市管理的政策研究等。從互相參照的議題與方法，本書或可為讀者提供一個廣闊的城市研究圖譜。

傳統・現代

城市研究的始創學者 Louis Wirth 指出，城市其中一個特性，就是在人口密度與複雜社交關係之中，展示傳統與現代的過渡。

他分辨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的社會關係。第一級是人與人、面對面的人情關係，如親屬朋友；第二級是人與人非經常的人際接觸，如客人與小店服務員的商務交往；第三級是功能性、流動性的接觸，如電話查詢、商貿會議等形式化活動。

Wirth認為城市其中一個特質是第二和第三級的接觸，大量取代第一級的人際關係。傳統社區人情網絡是基礎，鄰里相識，社區基本的衣食住行均在這個人際網絡進行。城市化的洗禮，建構現代化的城市生活；人們行走於城市，迎面而來都是陌生人，衣食住行均以功能性的商店和服務支援。

當然，從傳統到現代，二者絕非簡單的遞進關係。羅曉翔（第一章）就引清末南京的城市管理作案例，說明「傳統」與「現代」並非總是相互抵觸。在公共救濟與教育等「現代」層面，當年南京的城市管理均建基於「傳統」的基礎上。一方面，城中無論是哪條街道、哪個社區，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保留著某種形式的傳統空間；另一方面，傳統雖在，卻須依照特定環境下的現代邏輯進行「重建」。要麼腳踏實地為商業、為旅遊大興土木；要麼堂而皇之為文化、為未來改頭換面。更有甚者，原本並不存在的「歷史」，不但能夠被「恢復」，而且還可以借歷史重構旅遊景點引人注目。羅浩等（第八章）就以調查問卷呈現文化旅遊的多面性。傳統與現代時空交錯，不禁令人發問：到底何謂現代？傳統是現代的基礎、又或者只不過是包裝？除了傳統與現代的過渡，城市發展亦有殖民文化的烙印。李力庸（第二章）提出案例說明日治時期臺灣引入日本建築組合對城市形態的影響。歷史案例，往往能呈現城市發展的根源。

城市•生活

城市是個舞臺。清晨報紙小販已開始工作；早上街市商販賣菜賣肉，市聲鼎沸；中午靜下來，小販小休，家庭主婦煮飯去；到了黃昏晚飯前，城市又熱鬧起來，下班人潮在回家的途中買菜，下課的街童在街角踢「西瓜波」（第四章），整個社區是一張人與人交織出來的大網。

這是舊區的街道生態，但香港不少新興住宅是沒有街道的社區，大陸各地的中產小區近年來也朝此方向蓬勃發展。大商場解決生活所需。衣食住行，在一個大型的空間進行。在這些「便利家居」，住宅與商場、商場與地鐵，連結成管理配套程式。理性化、工具化、程式化的城市，有別於街道/住宅/商舖的社區。前者乾淨、獨立，鄰居互不相干；後者混雜、重人情。中產人士入住大型屋苑，就是喜歡屋苑的方便與簡單。當然，亦有一些較為揀擇的中產客，喜歡自成一國的純住宅區，商場是商場，住宅是住宅，進一步令生活環境「純潔」整齊。

城市化過程把生活作出理性的調節，這是城市研究常見的觀點。然而，李家翹（第四章）則借用香港殖民時期一種流行的民間活動，說明政治、生活、空間的複雜關係。香港基層在殖民地的都市空間自行尋找踢「西瓜波」的小空地。這種曾經流行的活動，很能生動地說明殖民地城市管理之下普通市民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自尋消遣。李祖喬（第三章）亦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為例，分析殖民權力所建構的休閒公園，如何成為民族主義以及公民抗爭的場所。李家翹與李祖喬的分析，均說明殖民權力的城市布局，當中有庶民爭取而創生的狹小空間。而譚偉峰（第五章）對香港商場的班雅明式論述，則集中於資本權力體現的消費空間之中，藝術家、作家、學者、遊人如何作出批評和詮釋。

媒體•空間

美國著名城市學者 Jane Jacobs 指出，街道是城市生活的基礎。她認為，街道愈多元化、有多元功能、有眾多不同的使用者，街道就愈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上文我指出，城市由傳統的人與人、面對面的接觸，轉到現代化、功能化的交往，社區改造重構，老化後再重建，或出現中產化、士紳化，各種進程產生多種多樣的都市生態。而城市生態的轉變，也大大改變了我們的城市生活面貌。Henri Lefebvre 及 David Harvey 等學者，更探討深層的資本主義物質生產條件，如何限制及引導城市空間的創造。他們以宏觀市場力量，去理解今天混雜浮動的城市變化。

在城市藝術、建築、傳媒、潮流時裝，我們可看出混雜的後現代風格，但全球資本主義仍然繼續支配今天的社會現實，無論在生產和階級關係亦然。在大城市中，窮人玩不起風格，有時候「世界都會」的倡議，往往強調消費社會的新潮風尚，忘記了城市生活中的公義主題。我們似乎並沒有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後現代世紀，而是仍然生活在現代生產邏輯之下，只不過今天經濟生活愈見急促，增長的需求刺激我們加速消費。不錯，我們是生活在消費主導的城市，但現代消費社會的基本動力，始終是生產權力而非後現代風格。

隨著資本全球流通，我們可以發現，在不同城市，均面對著相似的資本模式。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以大型物質生產、巨額投資、福特型管理為經濟主要動力。城市的形構相對穩定，各城市按其地理資源發展特色工業。但資本主義發展到第二階段，進入所謂的第二現代性，生產模式靈活變化，以彈性的採購與管理，生產與消費的流程可以分散全球，而且經濟動力轉移到流動性極高的創意產業、旅遊、物流、資訊處理等範疇。在此經濟力量的新階段，城市空間也愈來愈有跨境流動以及浮動不定的性質。

張彧啓（第六章）及馬傑偉（第七章）兩篇論文均討論媒體與城市生活的互動。前者探討動畫的想像世界如何落實為「趣都」的具體空間與城市心理；後者則探討跨國的時尚潮流如何落實於中國而成為本土城市文化。Lewis Mumford把城市比喻為舞臺，人在其中扮演角色，聯合演出現代生活的群戲。Mumford心目中的舞臺，偏重於社區感較強的衣食住行，但晚期資本主義的消費城市作為舞臺，是以媒體符號與空間的消費為主要的遊戲。

文化•旅遊

很多建於二十世紀的城市，因過分注重發展和現代化，沒有完善保留原屬於當地的城市景觀。有些城市，更為了向全世界展示其「摩登」的一面，紛紛以有利交通運輸及所謂理性規劃為原則，這些城市外觀往往同出一轍。二十世紀末，不少居民或遊

客，對功能化現代城市失去興趣。取而代之的街道，往往是空間景物多元化、店舖餐廳林立、步行區四通八達。富地方特色的小街小巷，不止是一般居民心中的城市，亦是遊客的至愛。今天符號經濟下的世界名城，都爭相發展和推廣旅遊業，以爭取國內與國外的遊客。伍世良和吳振揚（第九章）從地質多樣性的角度，提出城市性格可從城市人為建構以外的地理本質去發展旅遊。而羅浩等（第八章）則以實證研究去分析遊客對文化景觀的感知。在全球人口、文化、商品、空間流動性愈來愈高的形勢，不可取代的地方歷史變成是寶貴的旅遊資源。

城市・競爭

人在街上體驗建築、感受文化、捕捉經濟機遇、共同構成環境，街上的人自然成了街景的一部份。不同團體，包括發展商、投資者、規劃者、遊客、顧客、商家、以至附近居民，不分老幼，都是構造這些景貌不可或缺的部份。這些團體時而互相合作，時而互相抗衡，因此多元而錯綜複雜的歷史及欲望，也就展現在城市上，創造出本土文化地理及本土特色。

中國城市發展快速，步調與幅度遠超其他現代社會。中國城際的競爭、合作、參照，是中國城市形構的重要因素。沈建法（第十章）分析香港與深圳的城際關係，由一九七零年代的合作，到近年的競爭，並連繫到經濟結構的轉變，很能說明城市發展的軌迹與城際互動的脈絡。鄒經宇和熊燕（第十一章）以香港和臺灣的發展經驗，為中國城市化發展提供借鑒。而陳友華（第十二章）則為國內城市提供一套文化競爭力的標準化指標。

城際競爭將持續影響城市發展，但這個競爭過程同時出現同質化及特殊化的動力。我們在現代城市所見所經歷的，往往都是大同小異的商業環境。而事實上，現代城市經常互相抄襲成功的模式。我們出外旅遊時，有時候會因為看到熟悉的街景、商店或餐廳而覺得份外安全及方便；然而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出外，尤其是旅遊的時候，都渴望碰到新鮮的事物。那些熟悉和新鮮的事物混為一體，創造及再創造出城市的本土意義以及與其他地方的

關係。換言之，我們在城市可同時碰見本土獨特的文化、共有的區域文化和全球性的跨國文化；當地歷史揉合國家、區域，或全球商業文化，影像及符號，習俗與習慣，交織而成今天動態的城市景觀。

目錄

前言：城市研究跨學科議題與方法學

馬傑偉 vii

第一部 借鑒歷史

1. 清末南京的城市管理與城市認同

羅曉翔 3

2. 日治時期臺灣的建築組合與都市建設

李力庸 23

第二部 空間政治

3. 從維多利亞公園看香港的殖民空間政治

李祖喬 55

4. 重寫香港的殖民都市空間歷史：「西瓜波」

與日常生活中自由公共空間的構建

李家翹 81

5. 從班雅明理論分析香港時代廣場呈現的

都市景觀及其文化獨特性

譚偉峰 109

第三部 媒介城市

6. 日本「趣都」的誕生：
都市中的動畫、動畫中的都市
張或馨 141
7. 跨境視覺：中國城市視覺文化的流動趨勢
馬傑偉 161

第四部 旅遊城市

8. 基於旅遊動機和文化體驗的文化旅遊者市場細分
及感知意象研究：以南京玄武湖公園為例
羅浩、孫明嘉、劉佩 187
9. 從地質多樣性到地質旅遊：香港的潛力和限制
伍世良、吳振揚 207

第五部 城際競爭

10. 香港與深圳跨界城市發展研究
沈建法 225
11. 可持續的城市化發展：香港、臺灣的城市化發展
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社會機制建設的借鑒
鄒經宇、熊燕 255
12. 中國大陸區域文化競爭力評價
陳友華 271
- 作者簡介 301

第一部

借鑒歷史

1 清末南京的城市管理與城市認同

羅曉翔

在現代市政體系建立之前，城市管理一直是中國傳統城市發展的弱點和難點。與建立在自治基礎上的西歐城市相比，中國城市長期缺乏專門性的市政機構，城鄉事務由地方府、縣政府一體管理。由於人員、經費方面的限制，城市管理效率低下，城市化進程緩慢。直到二十世紀初，隨著地方自治的推進，現代市政體系才得以發展。由於地方自治與中國城市近代化之間的關係，以往的研究在時間上多集中於二十世紀初，在分析上則力圖解析「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裂變。¹與此同時，對於地方自治運動之前城市社會管理模式的轉變則較少關注。筆者認為，就城市管理而言，十九世紀是個極為關鍵的時期。在國家政治變遷的大背景下，城市社會管理的兩個層面——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都經歷了巨大轉變。這些轉變也許不以制度性改革為目的，但卻在客觀上為二十世紀的地方自治作了鋪墊和準備。本文試以十九世紀的南京為中心，討論城市管理模式的變遷，以及中國城市近代轉型與傳統基礎之間的聯繫。

官僚機構的外延：紳士參與

清代南京地處省會，為兩江總督所在地、江寧府城，上元、江寧二縣附郭。作為東南一大都會，城中五方雜處，社會構成複雜，事務繁多。但由於缺乏城市管理機構，大量具體事務由府、縣級衙門一體管理，地方政府機構的制度性缺陷，例如經費短缺，不可避免地制約著城市管理效率。明清以來，各州縣徵收的稅款大半作為起運送往中央。正如何朝暉（2006）在《明代縣政研究》中指出，地方正項存留稅收「大部份用於支付官吏、生員俸廩、月糧及預備倉儲，除此之外可以用於日常政務開支的所剩無幾，僅足以應付祭祀、慶賀等少量開支」（頁169），因此「縣官在面臨地方公共工程時往往畏首畏尾，缺乏熱情，因循苟且，得過且過。」（頁182）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發展。人員的制約也是長期困擾地方政府的問題。由於「國家設置的職官和經制吏員過少，大量的公務由差役、里胥來具體執行。這些胥役的身份不是國家的正式工作人員，不享受俸祿和升遷待遇，也不接受嚴格的考核。雖然他們只是從百姓中僉派或雇募的役，但其行為卻代表官府。這種非官非民的模糊身份，使他們不能受到國家機器內制度的約束，也不可能受到來自百姓的監督，因為他們的半官方身份使他們凌駕於百姓之上。」（何朝暉，2006:275）明清以來，無論在官方或民間記載中，胥役多被指為「貪」、「蠹」之徒，他們欺下瞞上、中飽私囊的行徑往往是引發社會矛盾的導火索。²

雖然制度性缺陷難以克服，但地方行政的客觀要求迫使官員們不斷尋求變通之法。自嘉慶初年開始，「官為監督、紳士經理」的模式逐漸體現其優越性。作為一個新的代理人階層，地方紳士開始頻繁參與城市事務管理，尤其在學校、善政及公共工程三個領域。

清代南京官辦學校有江寧府學與上元江寧兩縣學。作為城市的文化地標，府學與縣學雖然規制宏大，實際官撥經費卻十分有限。上元、江寧二縣地方存留稅款中，只有府學文廟祭祀與

香燭費預算每年共約五十二兩，此外灑掃、歲修經費全無。³而縣學「朔望香燭及灑掃各費，向無款項」。⁴由於疏於管理，不僅屋宇荒頽，每逢鄉試，吏胥甚至假縣學中「名宦、忠義諸祠為科場差局，溷雜不堪言狀」（甘熙，2007:136）。直至嘉慶元年（1796），「邑紳士王嘉言、徐朝珍、陳克鳴、吳翼元、陳元福、伍光瑜，仿淮安阮緩堂灑掃規約行之。初得二百金，由府存典生息，至戊辰（1808）積存銀一千五百兩，月捐停止，歲收息百五十金，灑掃敷用，並為歲修添補之費焉」。⁵在灑掃會紳士的努力下，縣學面貌漸有改觀。嘉慶二年（1797），經紳士稟官，嚴禁以縣學諸祠為科場差局，「立碑學宮二門內，以垂久遠」（甘熙，2007:136）。縣學青雲樓「上祀文昌帝君，朔望始開，平時扃閉，後為訓導假借，樓上下皆為棲宿之所。」道光十六年（1836），灑掃會紳士「將學廡添造屋宇數楹，較前寬展，另開署門以通出入」，將居住與祭祀區分隔，恢復了青雲樓上層的莊嚴感（甘熙，2007:131）。有了縣學的成功先例，江寧府學亦仿照此法，以「歲息」為專項基金，委派紳士管理。嘉慶二十二年（1817），江寧知府余需元「募銀五百兩，筭教授呂偉標延紳士胡鐘、端木煜，鄭銑、伍光瑜董其事，自丁丑（1817）存典生息，後至庚辰年（1820）共積存本銀一千一百兩，以歲息為府學修理各費，紳士亦歲有刻帳詳載入出之數，府發印簿交存紳士經營」。⁶府學灑掃亦仿縣學章程，至道光初年「積四百餘金存典生息備用」。⁷

除學校事務外，「官為監督、紳士經理」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善堂。善堂的出現使社會救濟常規化、制度化，是維持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善堂比較固定，有堂、局、公所，內設專職管理人員，並有捐款，借此購置房產、田地，以其息維持善堂的善舉，使善堂能保持永久。」（陳寶良，1996:197）清末南京規模最大、經營時間最長的兩個民間善堂——崇善堂與救生局——都始創於嘉慶時期。崇善堂的前身為同善堂與益善堂。前者建於嘉慶二年（1797），由「府教授金襄偕邑紳倡募」，主要堂務是恤嫠，位於龍王廟。道光間，「邑人復立益善堂在門西雙堂觀音庵，兩

堂舊恤四百四十名」。⁸救生局，又名生生堂，建於嘉慶初，由「里人葉釗培於江口捐屋數間，創救生會，因費絀中止」。嘉慶十九年（1814）春，紳士甘福捐金倡復，與同里龔鑒、楊銓、費士嵩「於下關草鞋夾起造迎江樓，設紅船救生、瘞旅，酌定章程，稟官行之。復於城內長樂渡設生生堂總局，以董其成，遴公正殷實紳董輪流值理，每歲刊刻清冊，歷歷可稽，自是四方善士踵而行之，設分局不一而足。」⁹這一時期許多紳士都同時參與多個慈善組織，如甘福，除救生局外，「餘如卹嫠、育嬰、瘞旅諸善舉，見義勇為，久垂利賴」。¹⁰

在公共工程建設上，政府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合作也逐漸增多。南京城南交通要道聚寶門，嘉慶間「城樓倒塌，十餘年來，有司莫之問」，「城闕石路損壞亦久」，雖有議修者，「格而不果行」。後縣令傅璋蒞任之初，籌款重修，「士庶咸悅，樂輸者眾，不數月而工竣。自城外長幹橋抵城內鎮淮橋，百餘丈皆墁以麻石，堅厚耐久，昔年崎嶇之徑，一變而為平坦之途，行者無不稱快」（甘熙，2007:89）。道光九年（1829）、十年（1830）間，俞德淵知江寧府。時「上新河久塞，紳士稟請挑浚，奉方伯委招集紳商勸捐，旬日間得金三萬餘兩，而其事舉行，民咸稱便。」（甘熙，2007:90）這一時期，大量公共工程都以鄉紳董事。如道光四年（1824）疏浚支河，紳士伍光瑜「董其役」（甘熙，2007:52）。紳士甘福也「因董濬秦淮議敘加按察使司經歷銜」。¹¹

嘉慶之後，南京紳士在地方公共事業中的活躍並非個別現象。究其原因，國家官僚機器對社會控制能力的減弱是個大背景。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對十八世紀中國的荒政研究中已經指出，人口迅速增長與貧困化趨勢，以及日益頻繁的自然災害「可以部份解釋地方政府管理的日益削弱，這種情況自乾隆末期起就已經開始。」（魏丕信，2006:311）社會與經濟環境的惡化迫使地方政府尋求紳士的幫助。在這國家-社會的互動關係中，一些學者，如羅威廉（William Rowe），看到了「市民社會」的發展（羅威廉，2005）；而夫馬進（2005:445-47）則稱之